

李少雍 著

司馬遷傳記文學論稿

重慶出版社

司马迁传记文学论稿

李少雍 著

重庆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重庆

书名题字：余冠英

责任编辑：王心富

封面设计：邵大维

李 少 雍 著

司马迁传记文学论稿

重 庆 出 版 社 出 版、发 行(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达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25 插页2 字数316千

1987年1月第一版 1987年1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300

*

ISBN 7-5366-0196-4

I · 25

书号：10114·262 定价：2.63元

司马迁的史学和文学（代序）

褚斌杰

古今人对司马迁《史记》的评论何止万千，但我以为最为要言不烦而精辟的莫过于鲁迅先生所说的两句话：“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要》）。前句是就《史记》一书在史学史上的地位说的；后句则揭示了《史记》一书的文学性，并道出了司马迁写作《史记》一书的缘由，及其高度的思想性。

我国是一个很重视历史文献的国家，远在殷、周时期，就已有所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史官制度。今天我们所见到的先秦典籍，除了阐释哲理和政治主张的诸子论著外，主要就是史学著作。先秦史书，已表现出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那就是除重事实以外，往往还寓评判褒贬于其中，也就是带有批判地总结历史经验的意义。其次，就是史文结合，即不仅记史实，而且重文采，它带给人的不只是历史知识，而具有引人入胜的文学性。这是我国史学一开始就具有的特点，也是十分值得珍视的地方。但我国早期的史书，受到时代、社会的局限，也有许多不够理想、完备的地方。如从书写体例上说，虽有编年记事和分国记事的不同，但都是断代的，而非全史，且对主要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缺

少完整的记载，往往是东鳞西爪，不能窥其始终。特别是在“史识”方面，还缺乏系统的历史观念，更缺少“成一家之言”的鲜明、强烈的倾向性。这说明我国史学，在先秦时代虽已有了良好的开端，有了值得珍视的成就，但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提高和发展，而在继往开来，完成史学史上这一飞跃的，就是司马迁及其《史记》的出现。

“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赵翼《廿二史札记》），这是一功。“全史”，一方面是指通古今，一方面是指记载的范围。这不仅只是体例的改进，而是反映了一种极为重要的历史观念的形成。司马迁开创了通古贯今（从黄帝至当代汉武帝）的“通史”体例，说明了他要求对我们民族做追本溯源的考察，说明他具有系统、完整的历史演变观念。而记载范围的扩大，特别是对当时各少数民族和各国交往史的研究和记述（见《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南越列传》和《朝鲜列传》等），说明他当时对于我们多民族统一国家的认识以及开放的眼光。而“以志人物”的纪传体的体例的确立，则又是司马迁的一项大创造。这也不仅仅是简单的体例改变问题，而是反映了司马迁对于构成历史主体的“人”以及人的价值观念的认识，这是司马迁继承先秦以来所谓“天人相分”的进步传统，保证历史科学科学性的一种努力。司马迁这一“发凡起例”的创造，在我国史学史上的影响是巨大的，所谓“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

当然，使“史记”成为“史家之绝唱”的还远不仅如此，更重要的还在于贯穿于《史记》全书的思想，即更为深刻的“史识”方面。司马迁曾说他写作《史记》的目的，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所谓“究天人之际”，就是要探究天道和人事之间的关系。这是古代社会历史观上有争论

的一大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司马迁是先秦以来“天人相分”的唯物主义思想的继承者，他反对天道可以干预人事，认为社会现象是由人的活动构成的，天是天，人是人，天属于自然现象，与人事没有必然的联系。例如他在《伯夷列传》中，就对“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旧传统观念提出了质疑。因为从许多历史人物的遭遇来看，那些品行不端，做尽坏事的奸邪之人，却往往富贵利达、安富尊容地度过一生，相反地那些正道直行，具有奇才异能之士，却往往遭苦受难终身，落得一场悲剧性的命运。因而他尖锐地提出了疑难：“余甚惑焉！佺所谓‘天道’，是邪非邪？”意思是说，那种旧日所宣扬的什么上天是无私而公平的，它总会帮助好人的思想，是完全无根据的，不能令人相信的。在《项羽本纪》中，他更抓住项羽覆亡时所说的“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的话，加以尖锐地评论说：“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是说项羽失败时曾怨恨各诸侯王背叛了自己，实际上这是怎样造成的呢？按照司马迁的分析：主要是他背弃与刘邦曾订立的盟约（“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而又乡土观念太重，一心怀归江东，无一统天下之大志；同时，义帝乃当时反秦之共主，他逐义帝而自立，使各路起义军不服。因此，失去人心，造成了众叛亲离的局面。接着司马迁又加以分析评论说：“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这是从项羽的主导思想和作风上加以分析，说他自矜其能，骄傲自大，刚愎自用，不知吸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想专恃匹夫之勇来征服天下，结果弄得仅称王五年，而军败乌江，国亡身死。但他自己却至死不寤，不知自责。因此，司马迁最后感叹地说：“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这是说，项羽的失败，完全是由于他在政治上，战略上，军事上有一系列的重大失策，绝非是什么“天

意”的结果。从《项羽本纪》的写作来看，司马迁对项羽在反对暴秦的起义中，摧枯拉朽的赫赫战功是十分肯定的，对这位西楚霸王的过人的才气和英雄主义精神也是倍加赞赏的，因此对他的失败也是充满同情的。但做为一个历史学家的司马迁，在评判历史人物，总结历史经验的时候，却又是理智的、严格的，他是要从人事的得失、成败上做实事求是的分析的。正是由于司马迁在历史观方面有“天人相分”的朴素唯物主义的观点，因此，他在写历史的时候，总是对人事、人谋作仔细的观察和记载，并从历史人物的客观活动中，分析其成败得失的原因，总结出有益的历史教训。

“通古今之变”，就是说要阐明历史的发展演变，寻找出历代王朝、各时期社会状况，不同政治制度的兴衰成败的道理。也就是他在《报任安书》中所自述的：“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略考其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另外，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也说了类似的话，所谓“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修史本来不能只满足于史料搜集，而是要通过史料了解历史的来龙去脉，即发展过程，从而考察和发现某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司马迁为自己提出的任务，“原始察终，见盛观衰”，也正是表达了这样的要求和目的。我们综观《史记》全书，他确实对—一个时代或—项具体制度或—个历史人物的命运，不断做着“原始察终”的考察，而且对其兴衰成败之理进行着说明。历史家的任务，本来就是要通过描述历史过程，总结历史经验，以为后人后世提供借鉴。在这方面，司马迁做为—个古代历史学家，纵然有着许多局限，但他确实在努力承担着这样的使命。

“成—家之言”，是说司马迁要借写作《史记》这样—部历史著作，来表达出他的某些独到的历史见解，表达他的某些社会、政治理想。司马迁写《史记》自许是很高的，他在《太史公自序》中

说，他写《史记》的理想，是要“窃比《春秋》”。《春秋》这部书，在我们今天看来，不过是孔子根据鲁国的史料编纂的一部编年史，而且十分简略，相当于一部大事记。但在司马迁当时却不这样看，当时一般人认为《春秋》一书是孔子晚年寄托自己一生的理想之作，所谓“因史记（指鲁史）作《春秋》，以当王法”。这部王法：“记天下之得失，而见所以然之故，甚幽而明，无传而著”，它“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太史公自序》），也就是说它含有“微言大义”，是存褒贬善恶，明辨是非于其中的。当然，《春秋》一书是否如此，暂可不说，但司马迁要使自己成为第二个孔子，使《史记》成为第二部《春秋》，这是说明了他的非凡抱负的。

《史记》是一部具有多方面创新性质的著作，它在体例、范围、写法等各方面，都别开生面，独树一帜，而最能表现其独到之处的，即“成一家之言”的地方，仍在于他的“史德”和“史识”。后世学者刘知几说，做为一个“良史”一定要具备才、学、识，章学诚又强调补充上“德”，当然这三者、四者做为良史的条件都是不可缺的，但其中最重要的还是德和识。试想做为一个史学家，没有持正不阿的无私态度，没有识大体、察根本的远见卓识，怎能写出一部有价值的历史著作呢？司马迁的理想，《史记》一书“成一家之言”的独到之处，正是表现在司马迁修治史书时的那种“不虚美，不隐恶”，公正无私，大义凛然的态度上，表现在一反当时流俗的精深见解上。

司马迁修著《史记》，不以涉嫌隐善恶，不以失败论英雄，不以爱憎掩功过，不以职业湮业绩。我觉得这就是《史记》一书的独到之处，正是司马迁伟大的地方。《史记》是一部上起黄帝下迄汉武帝时代的通史，对于古代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裁夺评判，虽然也需要气魄和眼光，但不涉嫌，远离个人利害，一般说来还是较为容易

持正的；而当笔锋接触到当朝的开国皇帝和在位之君的时候，就大不同了，是为当势者讳，掩盖历史真面目，还是尊重历史，仍然秉笔直书，这无疑是一个史学家的严峻考验。如果要敬到后一点，就需要非凡的勇气和胆识。如《史记》中写汉高祖刘邦，固然没有抹杀他推翻暴秦统治，建立伟大国家的作用，还写出了他的坚忍不拔等长处，但也没有放过对他的虚伪、狡诈和无赖品质的揭露。如书中通过具体情节，描写了刘邦在争天下时，为了自己逃命，竟亲手把儿子孝惠、女儿鲁元推下车；敌方要烹杀他的父亲，他还说要陪着一起吃肉喝汤等残忍无情和无赖的嘴脸；书中更写出他在得天下后，如何猜忌和诛杀曾与他共过患难的有功之臣等行径，这些不避忌讳的“直书”，在当时是很需要些勇气和胆识的。司马迁生活在武帝时代，而他对于“今上”的鞭笞也是毫不留情的。据说司马迁在《史记》中原著的《今上本纪》，因触忌太多已被抽掉，今本《史记》里的《孝武本纪》是后人补撰的。我们虽已不能从原著中看到司马迁是怎样来写武帝的，但从《史记》的其他篇章里，仍旧可以看到他对当世之君武帝的勾画。如在《封禅书》中，司马迁通过对武帝求仙访道的描写，讽刺了他的荒唐可笑和昏庸无知；《平准书》中，着意揭露了武帝的“多欲”，抨击了他为了贪图享乐和向外发动战争而对人民的压榨；在《酷吏列传》中，更借描写武帝周围的一群刽子手的狰狞面目，写出了武帝时代的暴力统治。如此不以涉嫌而隐恶的态度，这在封建时代史学家中，还是颇为少有的。

英雄是受敬仰的，但失败的英雄，特别是与本朝本代相竞而失败的人物，却常常不免遭到歪曲，所谓“成者王侯，败者贼”。但是司马迁却完全抛弃了这样的偏见。他写《项羽本纪》，注满了自己的热情。书中写项羽，勇武过人，盖世无双，带领三万精兵，就打败了刘邦五十六万大军。在不幸失败被围的时候，为了

证明自己的不馁，还以二十八骑，斩将夺旗，仍然以少胜多。最后，他惜战马，别美人，慷慨悲歌，令“左右皆泣，莫能仰视”。他的死不是被俘遭斩，而是因无颜见江东父老，不能受辱而自刎。临死前，还把自己的名马，赠与了邂逅相逢的“知己”，把头颅送给了久违的“故人”。项羽是一个失败者，但在司马迁的笔下，与当朝的开国之君刘邦相比，却是一个更为值得同情和崇敬的英雄。同样，司马迁写《陈涉世家》，曾经有人认为这是司马迁对农民起义的歌颂，对人民群众推动历史力量的认识，从实看来，司马迁当时未必有这样高的思想水平。但他对陈涉、吴广的那种揭竿而起，在大泽乡聚众哗变，“身被坚执锐，伐无道，诛暴秦”的英雄主义精神，是充分敬仰和赞扬的。其最后的失败，并未妨碍司马迁对他们做为反秦“首事”者功绩的肯定。汉名将李广，胆略超人，才气无双，“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匈奴称为“汉之飞将军”，屡建奇功，但其一生遭遇却很不幸。最后竟在外戚的排挤下，落入陷阱，被逼含愤自杀。这也是一位悲剧性的失败英雄人物，但司马迁为李广立传，写他的英雄业绩，笔锋是充满了感情的。传中不仅写他的治军，写他的战功；同时还写他的善射，“中石没镞”，写他一次被虏时佯死夺骑，写他得赏辄分，“家无余财”；总之，写他的胆略，写他的豪气，写他的魄力，写他的清白，处处表现他的道地的英雄本色。李广的年代与司马迁接近，属当代人物。李广的被压抑和悲惨遭遇，是武帝一手造成的，司马迁却秉公要表彰这样一位倒霉将军（武帝诡称他“数奇”），不以遭际论英雄。

司马迁对于暴秦的统治是极憎恶的，但他在评价秦始皇时，却又公允地说“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随时代不同而改变政治制度），成功大”。又说：“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悲夫！”（《六国

年表序》)这是说不能因素的“多暴”,朝代短等,就否认秦统一六国的进步和它顺从时变在政治制度上有所改革、有所建树的功劳。同样,司马迁对吴起、商鞅等法家人物是不喜欢的,曾斥责他们“刻暴少恩”,但在《吴起列传》、《商君列传》中,对他们使“楚之疆”、使秦“乡邑大治”的变法政绩则又是肯定的。再如,司马迁对吕后的嫉妒刻毒,在争宠立嗣时肢解戚夫人的罪恶行为曾予以无情的揭露,表现了极为深恶痛绝的感情。但在评价吕后当政的情况时,又公允地认为“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穡,衣食滋殖。”(《吕太后本纪》)如此等等,都说明司马迁做为一个史学家又十分能保持冷静的头脑,是不以个人爱憎掩历史人物之功过的。至于不以职业湮业绩,这我们只要看一看《史记》一书所写人物的范围,就可以深切地感受到了。他写了许多帝王将相,也写了平民。它写了伟大的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学者(不论学派),也写了游侠、刺客、俳优和卜祝之人(这在当时是被称为市井小人的),凡具有一定业绩,有一定贡献,有一技之长,对社会起过一定影响的人物,都在他著录之内。不仅如此,他还记载了妇女中某些比较有为的人物(如王陵、赵括的母亲,聂政的姊妹),以及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和当时接触到的国外情况。这无疑都反映了他的进步的社会观和特有的远大眼光。

《史记》是一部五十余万字的史学巨著,在两千年前,司马迁基本以一人之力为之,这已经是够令人惊异的了。而史料的丰富,规模的巨大,还远不足以尽《史记》一书之伟大价值,使《史记》一书成为“绝唱”的,更重要的还在于史学家司马迁非凡的“史识”,是在于他的人格和理想,是在于做为一个伟大史学家所不可缺少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司马迁说他修著《史记》的用意

就在于“述往事，思来者”。虽“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但在他看来往事必须追踪，是非必须评判，以为后世之借鉴；来者不可见，但必须留给他们足够的文化遗产，精神营养，以便更有条件开拓美好的未来，这就是司马迁做为一个伟大史学家所具有的风范，并使《史记》一书成为不朽之作的缘故。

二

史文并茂，本来也是先秦许多史学名著的特点，但史传文学是从《史记》开始的。它因人立传，集传成史，多方面运用文学手段来表现历史人物，使历史内容与艺术表现相结合，达到完美的统一，这又是司马迁《史记》一书所独具的成就。鲁迅说：《史记》一书“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称赞它为“无韵之《离骚》”，这正是就其文学成就和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来说的。

《史记》的文学性，主要表现在它把事、理、情熔为一炉。生动形象的写人记事，借事以达理，借事、理以抒情，从而又使它成功为一部划时代的文学巨著。

《史记》一书，如前所述是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的著作，他是要通过记人写事以达理，是有着鲜明、强烈的倾向性的。而司马迁的达理，却主要不是靠着他自己发议论或以抽象的判断的形式硬塞给读者的，而在很多情况之下，是通过对历史过程的叙述，是通过对人物活动的具体记载和描写，自然而然地体现出来、流露出来的，这就是所谓“寓论断于序事”之中。关于这一点古人也已有所觉察和推崇，如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六说：“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平准书》末载卜式语，《王翦传》末载客语，《荆轲传》末载鲁句践语，《鼂错

传》末载邓公与景帝语，《武安侯田蚡传》末载武帝语，皆史家于序事中寓论断法也。”“寓论断于序事”确实是司马迁《史记》的特点，但这一特点与其说是特殊的“史法”，不如直接说这就是一种文学手法，是运用文学手法来写历史。因为文学作品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作家的思想、观点，作品的倾向性，不是诉诸于直接发议论和由作家直接出面做出裁决，而是靠着对事物的生动而客观的描述体现出来，而且“作者的见解愈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愈好。”（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顾炎武为了说明司马迁《史记》一书的这一特点，举了《平准书》、《王翦传》等五个例子，这几个例子都是在篇末借某个有关历史人物的对话和评论，表达了司马迁的“微旨”，这固然可称为“寓论断于序事”之中，但这在《史记》中还并非是最典型的例证。《史记》人物传记的倾向性，作者的褒贬揄扬往往是通过整个人物事迹的叙述，情节的进展，以及某些近于细节的刻画，不待评论而表现出来；其事、理、情更为浑然一体，而在不知不觉中启迪着读者的思想，摇撼着读者的感情。例如书中的《李将军列传》、《淮阴侯列传》、《叔孙通列传》、《李斯列传》等，都是通过写具体史实，让事实本身说话，而表达了强烈的是非爱憎的。《李将军列传》写李广的治军、写他受士卒的爱戴，写他深入敌境被困，吏士皆无人色，而他“意气自如”，酣战到底；又写他终不被武帝信赏，最后因不得大将军卫青的欢心而被逼自杀。在《淮阴侯列传》中写韩信的战功，写他的威高震主，写汉高祖刘邦对他的“畏恶其能”，写韩信自以为有功并有感于刘邦对他的知遇之恩而不措意于刘邦对他的猜忌，最后终于中计被杀。显然司马迁对这样两个人物都是深为同情的，是寓是非、爱憎、褒贬于其中的，而作者的思想倾向性，却主要并不靠外加的议论，而是通过对人物活动、遭际的描写，引导读者自己去体味其中的含意和是非之理。叔孙通、李斯是作者所憎恶的人物，一

个以面谀得势，一个以帮凶著称，而作者对他们的揭露，同样也是寓于叙事之中的。这些都增强了《史记》一书的文学特点和文学效能。

当然只是借事以达理，我认为还不是构成《史记》一书强烈文学色彩的主要原因，更主要的还在于《史记》虽是一部历史著作，但作者于写作时，却在占有大量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做了缜密的艺术性构思，调动了多方面的艺术手段，使之文学化。这主要表现在故事情节的构思和安排上，人物性格的刻画上，以及语言技巧的运用上等诸多方面。

《史记》是一部以写人物为中心的传记体著作。《史记》人物传记的一个重大特点，就是具有强烈的引人入胜的故事性。它写人物生平，既不是平铺直叙地介绍梗概，也不静止地介绍人物的言行，而是生动地写出人物之间的关系、矛盾和冲突，构成曲折动人的故事情节，引人入胜。

《史记》中的一些主要人物传记，都是力图比较完整地写出人物不平凡的一生和命运的。但如果我们注意一下这些人物传记的结构，就可以发现它们往往总是由一两个或更多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情节、场面描写所构成的，也就是说是由某些相对完整的有冲突、有矛盾的小故事相连贯而成的。这样，就使它摆脱了记载人物生平时的单调和枯燥，以至具有故事性和戏剧性了。试以书中《廉颇 蔺相如 列传》为例，文中写蔺相如一生的功绩时，主要写了“完璧归赵”、“渑池相会”、“廉颇负荆”等几个情节。而每个情节都有矛盾的开端，冲突与发展，最后由矛盾的解决而结束，也就是说都具有相对独立、完整的故事性。例如在“完璧归赵”的情节里，一开始写赵得楚和氏璧，秦派人下书赵王，愿以十五城换取宝物。当时秦强而多诈，因而使赵产生了“欲予秦，秦犹恐不可得，徒见欺；欲勿予，即患秦兵之来”的难以解决的矛

盾。这时蔺相如被荐出场了，他表示愿“奉璧西入秦”。接着写相如入秦后，果然“秦王无意偿赵城”，因而产生了尖锐、惊险的冲突，出现了“大王必欲急臣，臣头今与璧俱碎于柱矣”的斗争高潮。经过几次周折，相如终归璧于赵，取得了“秦亦不以城予赵，赵亦终不予秦璧”的结局，矛盾得到了解决。“渑池相会”的情节也是如此。秦打败赵国，约赵王会于渑池。因而产生了去或是不去的矛盾。去则可能受辱，不去则又“示赵弱”。经过计议，赵王在相如陪从下，毅然赴会。果然在酣饮时，秦王令赵王鼓瑟，并令史官记录，以侮辱赵王，并由群臣提出“请以赵十五城为秦王寿”的无理要求，从而形成了尖锐冲突。这时蔺相如挺身而出，抱着“以颈血溅大王”的勇气和决心，给秦王及其群臣以相应的还击，才解脱了赵王的窘境，使“秦王竟酒，终不能加胜于赵”，解决了矛盾。接着，文中写了第三个故事，待相如归国以后，以功大拜为上卿，从而出现了廉颇与之争地位的矛盾。廉颇数欲逼辱，而相如再三退让，甚至引起相如下属的不服。但最后终因蔺相如“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高义”，感动了廉颇，以“负荆请罪”结束了这一矛盾冲突。

《史记》中的人物传记，一般都是以这种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连贯的情节描写构成的，如著名的《项羽本纪》，主要写了“巨鹿之战”、“鸿门之宴”、“垓下之围”，《李将军列传》集中写了“计胜千骑”、“夺骑归汉”、“力战解围”，《魏公子列传》主要写了“与魏王博”、“奉侯嬴为上客”、“窃符救赵”、“与卖浆者游”等几个情节，每一情节都由人物的关系和一定的矛盾冲突所构成，它们就象戏剧中的场次一样，既相对完整又递相连接，从而完成了对人物生平活动和遭际的刻画。再加上《史记》记人物不弃细节，相反地却常常利用生动的、富有特征的细节来使人物形象更为丰满；写人物对话口吻逼真，声貌毕现，精炼传神。这都极大的增强了《史记》

一书的文学性。唐宋以后，司马迁的文笔曾被许多古文大师奉为楷模，实际上《史记》做为一部以写人物为口心和富于故事性的作品，对于后世小说，以至于戏剧文学的影响是更为深远巨大的。这我们只要看看后世小说、戏剧对《史记》故事的取材，以及在艺术构思和表现方法方面的一些相承特点，就可以清楚了。

当然，谈到《史记》的文学性，还不能不谈到《史记》文章中的感情色彩。记人写事的具体完整、生动形貌，固然是《史记》一书文学上成功的地方，但使《史记》一书侧立于文学之林的，更在贯穿于全书的感情因素，即洋溢于许多传记之中字里行间的作者的浓郁之情。本来，司马迁写作《史记》一书就是有其感情上的原因和动力的。这就是他在身遭李陵之祸以后，在强烈的社会刺激下所感悟到的、而他自己也身体力行了的“发愤著书”说。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说：

所以隐忍苟活，幽于圜墙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

接着司马迁说了“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云云，概述了自己完成《史记》一书写作的缘由和经过。这段话既表达了司马迁对历史上、社会上诸多不幸事件的感受，也表现了司马迁自己写《史记》时的强烈感情色彩。他写《史记》既是为了使历史上那些“倜傥非常之人”得到称道，不致泯灭；同时也是为了表达自己

的某些社会感受和寄托自己的强烈感情，使自己的“郁结”得以发泄，“文采”得以表露。这正与屈原的“道思作颂，聊以自救兮！”

“发愤以抒情”异曲同工，这样，《史记》就不仅是一部史书，也是一部通过历史来表达感情——不，直是表达社会激情的艺术了。

我们纵观《史记》全书，司马迁每写一文一传，几乎都不是专为了记事实，而是都有着自己的强烈的感触与感情在。他在《太史公自序》中曾历书了他去着手写每篇传记的缘由，如“末世争利，维彼奔义；让国饿死，天下称之，作《伯夷列传》”；“能以富贵下贫贱，贤能诎于不肖，唯信陵君为能行之，作《魏公子列传》”；“勇于当敌，仁爱士卒，号令不烦，师徒乡之，作《李将军列传》”；其他如“嘉伯之让，作《吴世家》”；“嘉庄王之义，作《楚世家》”；“嘉参不伐功矜能，作《曹相国世家》”等等，说明司马迁每写一人物都有着他的独契于心的感受，都有着他的感情趋向，也就是说他是怀着丰富感情而下笔的。我们再看他许多传后的赞文，就更可以知道他在写作《史记》各篇人物传记时，所寄蕴的丰厚的感情。他时而说“心向往之”，“想见其为人”；时而称“悲其志”；时而称“废书而叹”；时而称“余甚恨之”；甚至说“未尝不流涕也”；这就说明历史的兴衰、许多人物的命运都牵动着司马迁的感情，而这种感情又通过他的笔端喷薄而出，从而使《史记》一书能够融记事、达理和传情于一炉，成为一部强烈文学性的作品。

总之，司马迁的《史记》无论在史学方面或文学方面，其成就都是巨大的，以上所述不过是我的一点粗浅的认识而已。

李少雍同志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攻读硕士研究生，结业时撰有《〈史记〉纪传体对我国小说发展的影响》一文，我因应余冠英先生之约，参加答辩工作，得以先读为快。少雍同志该文，对《史记》纪传体的创立、艺术特征和在小说发展史上的影